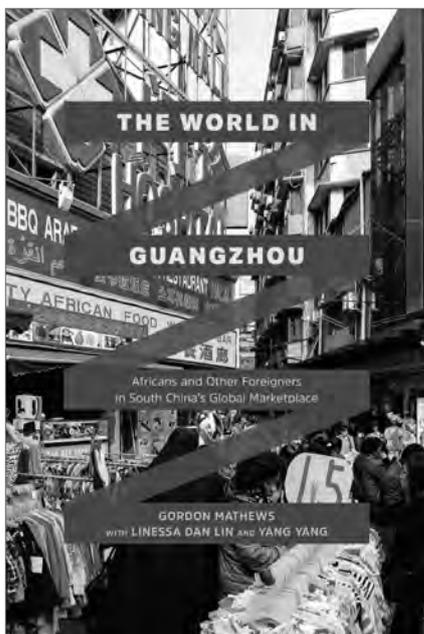


「低端全球化」視角下的 廣州非洲人

——評 Gordon Mathews with Linessa Dan Lin and Yang Yang, *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

● 江秋雨



Gordon Mathews with Linessa Dan Lin and Yang Yang, *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今天的廣州就像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紐約那樣，吸引着大批懷揣淘金夢的外國人。這其中有一部分是從事貿易的非洲人，他們把中國製造的商品（包括山寨仿製品或假貨）出口至自己的國家。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與他的兩位學生林丹和楊場合著的《世界在廣州：外籍居民和中國南方都市的國際化》（*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以下簡稱《世界在廣州》，引用只註頁碼）^①，探討了廣州作為新興的「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中心城市在全球商品貿易鏈中的作用和影響，分析在語言不相通、文化及宗教信仰有差異的情況下，中國人如何同非洲人開展經濟活動，以及非洲人的社會融入情況^②。

雖然本書並不是第一本關於廣州非洲人群體的研究書籍^③，但它

《世界在廣州》探討了廣州作為新興的「低端全球化」中心城市在全球商品貿易鏈中的作用和影響，分析在語言不相通、文化及宗教信仰有差異的情況下，中國人如何同非洲人開展經濟活動，以及非洲人的社會融入情況。

通過非洲人在廣州的經歷，《世界在廣州》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建立在非正式的聲譽和信任，而不是正式法律契約之上的全球化案例。「低端全球化」的非正式經濟關係是如何在中國人和非洲人之間建立起來的？

應該是第一部從全球化經濟角度來探討此社會現象的專著。通過2010至2014年間的多次田野調查，作者敏銳地觀察並記錄了外國人群體在廣州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以及他們在廣州全球化進程中的互動關係，巧妙地將全球化和都市多元族群這兩個學界熱點結合在一起，進而展望廣州乃至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

通過非洲人在廣州的經歷，《世界在廣州》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建立在非正式的聲譽和信任，而不是正式法律契約之上的全球化案例。作者希望通過廣州的例子，也能令讀者對世界其他地方的類似現象有所了解。筆者擬從本書的研究主題、論述框架、全書亮點及商榷意見四個方面展開討論。

一 研究主題

作者在第一章的引言中開門見山地提出了本書研究的兩個核心問題：在經濟上，「低端全球化」的非正式經濟關係是如何在中國人和非洲人這兩個文化迥異的群體之間建立起來的？在社會文化上，當愈來愈多的非洲人選擇在中國工作和生活，成家立業，那麼未來他們是否能夠融入當地社會，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頁3）？甚至，將來會出現一名中國本土版本的奧巴馬（Barack Obama）嗎？

本書的研究主題遂圍繞這兩個核心問題展開。首先是「低端全球化」，這是麥高登近十年研究的主題^④。作者認為，全球化並不只由麥當勞（McDonald's）、可口可樂（Coca-Cola）這樣的巨型跨國企業

所代表，也不只涉及摩天高樓、律師顧問、財政預算等特徵；與大型跨國公司所代表的「高端全球化」（high-end globalization）相對應的，還有「低端全球化」。他對此的定義是：「低成本非正式的（半合法或非法）交易中人與物品的跨國界流動，通常見於發展中國家，但在全球各地均有體現。」（頁81）舉例而言，一個非洲商人攜帶不多的美金來到廣州，把小家電、成衣、皮鞋、家具等或多或少是山寨仿製品的商品運回非洲市場，在此過程中時常存在着賄賂海關和逃稅等不合法的操作，他便成為了麥高登的「低端全球化」概念中的參與實踐者。其次是非洲人在中國的社會融入情況和對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影響。作者認為，中國雖然有五十六個文化各異的少數民族（應為五十五個，書中筆誤，頁3），但是主流社會文化一直以來都是以佔人口92%的漢族為代表，因此作者將中國視為單一文化（mono-cultural）和單一民族（monoethnic）的社會。非洲人在中國落地生根，不僅僅是對中國社會同質性的衝擊，也將導致中國人對種族/膚色、公民/國籍等概念的重新建構。

二 論述框架

全書共分八章，各有側重，筆者分為五個部分進行簡要概述。

（一）非洲人和其他外國人概況

在第一至三章，作者從外國人聚居區的角度簡要介紹了廣州歷史。第一章指出，從唐代開始，世

界各地的商人就來到廣州開展貿易。廣州的外國人聚居區從十八世紀的公行和十九世紀的沙面，到近幾年主要集中在高端商業匯聚的珠江新城和淘金一帶，以及被麥高登稱為「低端全球化」中心的小北。和其他城中村不同的是，小北一帶來來往往的幾乎全是非洲人、阿拉伯人和中國各地的流動人口。雖然在小北等地外國人的出現頻率非常高，但作者認為外國人人數在龐大的廣州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並不大。

在第二章中，作者講述了八個不同背景的外國人在廣州的經歷，包括加拿大的自由職業者、尼日利亞的簽證逾期滯留者、美國和阿拉伯的商人、埃塞俄比亞的女性高端時尚買手，還有西歐的商業中介，以及來自肯尼亞本來想當教師的女接待員、伊朗的IT專才——在展現廣州外國人群體的多樣性的同時，探討了中國社會歧視和偏見的複雜性。

作者在第三章指出，最早的一批非洲商人在1990年代末期至2000年代初期來到廣州。非洲人在廣州的人數尚無定論，作者在2013至2014年的田野調查期間估計人數在一萬到兩萬之間（頁56）；非洲商人以男性為主，女性大約佔30%。作者坦承由於非洲女性商人不常在廣州久留，因此對她們的案例研究也相應不足。非洲人在廣州使用的語言以英文為主，一部分非洲人也或多或少地掌握了中文，可以進行溝通。雖然非洲人個體之間在語言、文化和收入上差異較大，但作者調查顯示非洲商人大多來自當地的中產階級，受過高等教育

（大學本科），個別還來自非常富裕的家庭。

（二）中非交往

在第三章後半部，作者從商業和生活交往兩方面探討了中國人和非洲人之間的關係。兩者交往最主要的一個環節就是商業往來。在此過程中，互相欺騙偶有發生，比如，中介或翻譯偷偷收取約10%的佣金；中國商人以次充好，或者將貨品偷龍轉鳳；非洲商人攜帶貨物潛逃，等等。雖然大部分中國和非洲商人是誠實可靠的，但一些負面事件經過誇大的發酵傳播，導致中非商人之間產生了「基於文化層面的錯誤假設，造成雙方在商業合作上很大程度的誤解和不信任」（頁70）：中方認為非洲發展滯後，就理所當然地假設非洲人容易欺騙；同時非方先入為主地認為中國商人不講誠信，因此通過最大限度的討價還價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導致一方面非洲商人不切實際地壓低價格，而另一方面中國商人為了留住客戶，往往通過降低產品質量來迎合過低的價格。除此以外，語言障礙也會造成一定的誤解。比如，在一場就非洲商人是否已支付完貨物餘款的糾紛中，中方翻譯未能正確和全面地傳達雙方的本意，從而導致誤解的產生。幸而該非洲商人的一位中文流利的非洲朋友前來替他化解了誤會，並幫他補齊了拖欠的餘款。

在日常交往方面，雖然雙方各有一些正面和客觀的看法，但彼此之間的不信任依舊普遍存在。比如，當一個非政府綜合服務中心向

非洲人與中國人的商業往來中，互相欺騙偶有發生，語言障礙也會造成一定的誤解。雖然雙方各有一些正面和客觀的看法，但彼此之間的不信任普遍存在。中國人對非洲的膚淺理解和不尊重是造成雙方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高端全球化」中，法律合同有着絕對權威效力，但是在「低端全球化」中，合同效力幾乎為零，法庭也被認為沒有實際作用。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是「低端全球化」的基礎，因此商人更注重維繫同客戶的關係。

非洲人提供免費中文課程時，部分非洲人懷疑其為政府服務，另有所圖。其中，中國人對非洲的膚淺理解和不尊重是造成雙方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比如，認為非洲是一個國家；在公共場所對非洲人體味不加掩飾的捂鼻行為；在關於非洲人的照片展上，主辦方不顧一位非洲聽眾的反對，強行要求他代表非洲人群體在中國媒體面前發表意見，等等。另外，一些非洲人的不當言行也給整個非洲人群體的聲譽帶來了負面影響，如拖欠國際電話費；一些非洲人（尤其是非洲男性對中國女性）的欠妥行為通過社交網絡傳播，也加劇了中非之間的矛盾。

（三）「低端全球化」的實踐

作者在第四章討論了「低端全球化」的內涵和運作模式，認為與「高端全球化」有幾個不同之處。首先是對合法性的理解不同。在中國同大部分非洲、中東和南亞國家之間的貿易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山寨偽造品出口以及賄賂海關的不合法現象，但卻為「低端全球化」的參與者普遍接受。其次，「低端全球化」和「非正式」掛鉤。在「高端全球化」中，法律合同有着絕對權威效力，但是在「低端全球化」中，合同效力幾乎為零，基本遵循「買者自負」（*caveat emptor*）原則，法庭也被認為沒有實際作用；而口口相傳的聲譽，反而是最重要的。在「低端全球化」中解決爭端的方法也不依靠正式法律途徑，而更多地依靠群體中的「調解員」（*peace keeper*）。再者，「低端全球化」更

類似一種社會實踐，而不是法律關係。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是「低端全球化」的基礎，因此「低端全球化」中的商人更注重維繫同客戶的關係。作者指出「低端全球化」並不局限於發展中國家和非洲人群體，在發達國家也有類似的經濟活動，在廣州的各個群體都可能同時參與（但作者還是以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印度人為例）。作者認為，「低端全球化」的理論也便於我們理解與廣州類似的其他城市的商業模式，如義烏、曼谷等。

作者接着在第五章探討了「低端全球化」經濟的不確定性，尤其體現在部分非洲商人（主要是來自尼日利亞的伊博人，*Igbo*）在簽證逾期滯留的不合法狀態下開展經濟活動。作者認為，尼日利亞社會文化和親友圈對金錢和地位的高期望，使得這些外出經商的伊博人比其他外國人群體承受了更大的社會壓力以及有着更深的衣錦還鄉的渴望。因此，當他們由於各種原因不能為簽證續期的時候，往往選擇破釜沉舟，在廣州滯留，直至能夠體面地返鄉為止。

第六章探討了「低端全球化」的主要實踐者——非洲的物流商和商業中介的身份重合問題：大部分的物流商也是商業中介，而大部分的商業中介也是中國社會和非洲商人之間的「文化中間人」（*cultural broker*）。為了維繫客戶，商業中介不僅幫助客戶打理生意，還無微不至地照顧他們在廣州的日常生活起居，為客戶提供認識中國社會文化、法律和生存經驗等超越了普遍意義上的生意往來的服務，比如陪

客戶看病、提供他們的辦公室作為客戶休閒社交場所等。

(四) 宗教生活

宗教在非洲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中心角色，作者在第七章指出，這也是中國人和非洲人的一個重要區別之一。宗教不僅是非洲人身份認同的一部分，宗教教義也是很多非洲人日常生活和生意往來的行為準則。廣州一些基督教會還擔負着道德監督和維護秩序的責任：不僅為簽證逾期滯留者籌措罰款，幫助性工作者改行，還奉勸教友遠離非法活動等。作者指出，在小北的非洲人大部分是穆斯林，而在廣園西路市場聚集的非洲人多數信奉基督教。由於歷史的原因，伊斯蘭教被看作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部分，而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被視為舶來品，因此政府對其態度相對保守。穆斯林通用阿拉伯語進行宗教儀式，讓母語不通的各個群體都能夠一起共同禮拜；而一些基督教會按照政府要求，將中國公民和外國公民分開聚會，導致中外成員隔離。作者接觸到的一些基督教地下教會，因沒有在政府部門註冊而屬非法，其成員五六成以上都是簽證逾期滯留者（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尼日利亞）；政府因而對這些教會大力稽查，導致教會成員對政府心生不滿。

(五) 社會融入與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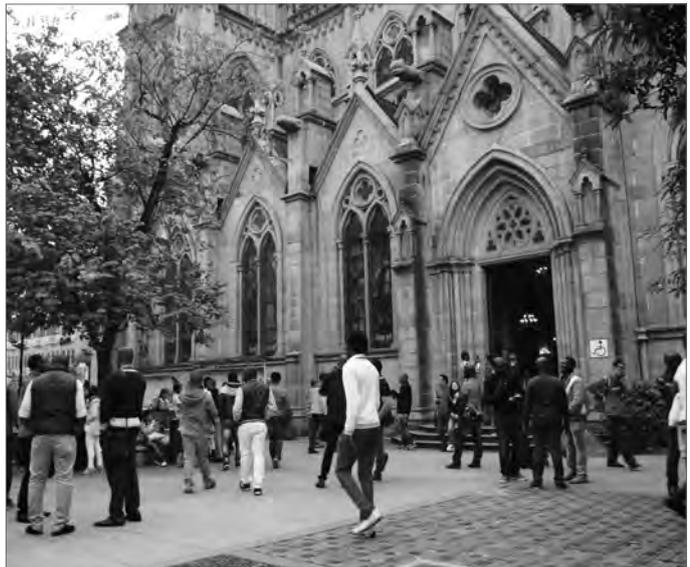
在第八章中，作者提到非洲人的中國化體現在三個方面：法律上（獲得居留證）、文化上（認同中國

文化，熟練掌握中文）和婚姻親緣上（同中國人組建家庭）。其中，又以婚姻親緣這種方式最為常見。作者在田野中遇到的實例大都是尼日利亞的伊博族男性和戶口不在廣州的中國女性通婚，他們的子女即成為擁有中國國籍的混血兒，從而對中國現有的以血緣紐帶關係為基礎的族群身份歸屬（ethnic belonging）和以漢民族為主的同質性社會造成衝擊。作者認為，隨着全球化和種族間的通婚，中國現有的族群身份歸屬最終將會被以北美國家為代表的建立在契約基礎上的公民身份歸屬（civic belonging）所取代。預計百年後，廣州也會變成一個多元文化、多族群雜居的城市，這也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一個趨勢（頁219-20）。

隨着全球化和種族間的通婚，中國現有的族群身份歸屬最終將會被以北美國家為代表的建立在契約基礎上的公民身份歸屬所取代。預計百年後，廣州也會變成一個多元文化、多族群雜居的城市。

三 全書亮點

在全球化和中非合作日益緊密的框架下，《世界在廣州》的主題和



周日崇拜結束後，非洲信徒三三兩兩聚集在廣州石室聖心教堂前。（圖片由江秋雨提供）

內容可謂切合當前的政經熱點，書中全面和細緻的田野記錄既豐富了在廣州的非洲人和其他外國人群體的研究，同時也為後續學者的類似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筆者此處着重選取該書寫作風格和比較視角的運用這兩點加以闡述。

(一) 通俗化的人類學讀物

在人類學發展歷史上，一直有學者致力於寫作面向公眾的讀物，人類學著述的讀者也不僅僅局限於學科內。比如，上世紀前半葉，美國人類學家米德 (Margaret Mead) 和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的著作就受到了來自不同背景的讀者喜愛。論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美人類學界逐漸學院化。部分人類學家認為通俗化會降低學術可信度，通俗化的作品也被認為是膚淺的，因而對這種寫作取向非常謹慎。這導致人類學的大眾曝光率降低，學科的社會影響力減弱^⑤。《世界在廣州》是對人類學寫作學院化的反思。作者認為，人類學如果僅僅局限於寫作複雜的學術文章和發展理論，為特定的專業讀者服務，那會是一種「極大的損失」；「……至少在一個小的程度上，使人類學通俗化，讓這本書能夠被想了解它的讀者所理解 and 產生興趣」(頁4)，是作者選擇本書寫作風格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因此，雖然本書是在一個宏大的全球化框架下探討廣州多族群群體的社會、經濟活動，但是全書鮮有理論闡述，各章節均有大量的田野實例和訪談節選。作者行文文筆輕鬆，語氣略帶談諧，描寫生動細緻，向我們展示

了人類學家如何寫出面向大眾的「接地氣」讀物。

(二) 宏觀的比較視野

在任何社會中，歧視和偏見都是不可能避免的。和以往的廣州的非洲人群體研究不同，作者不再將非洲人剝離出來，視為一個孤立的群體，而是將中國人和非洲人之間的互動，放到了中國人和外國人關係這個大框架中去分析，探討種族/膚色、國籍以及經濟地位在外國人的廣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產生的影響，運用一個宏觀的比較研究視角來深入分析非洲人和中國人的關係。通過八位外國人在廣州的個人經歷，作者從三個層面探討了中國社會歧視和偏見的複雜性。

首先，人們常常將種族/膚色和社會經濟地位關聯起來，即膚色愈淺，其社會待遇愈高：「對在廣州的中國人(同時也適用於大部分外國人群體)而言，對膚色的認知有兩個極端，一端是來自歐美的白人，他們一般被優待；另一端是來自非洲的黑人，他們常常被看不起。日本人和韓國人被視為和白人等同……而南亞人和黑人的地位差不多，中東和拉丁美洲的人地位則近似白人。」(頁46)在這樣的邏輯下，案例中來自美國的白人商人可以在廣州無證駕駛，為所欲為(頁33-34)；身為伊朗人的IT專才認為自己被廣州警察善待是因為皮膚白(頁41)；而來自肯尼亞的女接待員因為自己的膚色被拒絕進入高級會所(頁39)。作者指出，表面上膚色是造成歧視的原因，但膚色所

和以往的廣州的非洲人群體研究不同，作者不再將非洲人視為一個孤立的群體，而是將中國人和非洲人之間的互動，放到了中國人和外國人關係這個大框架中去分析，探討種族/膚色、國籍以及經濟地位在外國人的廣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產生的影響。

暗示的社會經濟地位才是歧視產生的主要前提(頁45)。

其次，雖然種族/膚色和社會經濟地位的二元邏輯在現實中很常見，但現實遠比這種簡單的關聯複雜得多。通過來自埃塞俄比亞時尚女商人和來自西歐某發達國家的白人男中介的對比，作者進一步探討了這種複雜性：女商人雖然是來自貧窮的國家，也因為自己的膚色(或女性身份)被中國和阿拉伯的商人看不起，但她其實生活優渥，採購亦追求品質，恰恰是處於全球化商貿經濟活動中較高端的「世界公民」(頁43)。反之，雖然表面上男中介的國籍、膚色都處在膚色認知的頂端，實際上卻是生意慘淡，生活潦倒。作者指出：「國籍、膚色、性別在一定程度上很重要，但是相比之下，在他們的生活中，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和人生際遇才是更重要的。」(頁38)作者還指出，即使在膚色、國籍相同的群體裏，一部分亞群體也會因為各種其他原因受到歧視，比如尼日利亞的伊博人受到其他非洲人群體的歧視(雖然大家都是非洲人)；或者中國漢族對維吾爾族的歧視(雖然大家都是中國國籍)。

最後，作者指出，有時候偏見和種族/膚色無關，而和中國籍身份有關。比如，一位中國父親不想女兒嫁給非洲人，同樣地，他也不想女兒嫁給其他外國人，即使是白種人也不行(頁206)。如果研究者單純地探討中國人和非洲人的關係，而不同時比較中國人和其他外國人的關係，就可能得出片面的結論，認為不願將女兒嫁給非洲人的中國父親是對非洲人有偏見，但

其實他更介意的是外國人這個因素。非洲人和中國人的關係，首先是一種中外關係，然後才有種族/膚色、社會經濟地位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對身處其中的個體產生不同的影響。

四 幾點商榷

作為一部出色的民族志，《世界在廣州》也有幾點值得商榷之處。

(一) 歷史研究有待深入

作者在第一章中對廣州歷史的概括對全書起到了鋪墊作用，但筆者認為有關中國歷史(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敘述可以再深厚一些。人類學家蕭鳳霞認為社會文化現象和概念需要放到具體的歷史過程中才能夠被理解，如果研究者只強調在田野中獲得的資料而忽視了對歷史材料的批判解構，也就會缺少歷史層面的比較視角^⑥。

第四章簡單敘述了作者走訪義烏(即作者列舉的六個「低端全球化」城市之一)的旅程。義烏有着與廣州類似的貿易發展歷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延續性在義烏中同樣得到了體現。如果不詳細分析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單獨地分析義烏的貿易現狀，就容易忽視現象形成背後的歷史因素，因此才會出現作者的感歎：「義烏——雖然與有着很多工廠的廣東距離遙遠——但不知為何也成為了『低端全球化』的一個主要城市。」(頁106)

此外，在廣州形成的外國人群體並不是由廣州歷史上作為貿易港

作者認為廣州政府對伊斯蘭教的相對寬鬆態度，是因為伊斯蘭教在中國有較悠長的歷史而被政府視作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作者忽略了目前「一帶一路」經濟政策在其中的引導作用。

本書鮮有非洲女性商人案例，雖然這符合大部分非洲女性商人在廣州停留短、基數小的實際狀況，但是否與作者的抽樣方法有關？這也造成了作者在討論歧視問題的時候，由於性別視角的缺失而不能夠深入探討性別這個因素。

口這個單一因素造成的，背後還有更深厚的社會和政治因素。比如，中國政府的經濟戰略發展規劃也是導致大量穆斯林（包括非洲和阿拉伯）商人在廣州和義烏聚集的重要原因之一^⑦。2013年，廣州、義烏等城市都被納入了「一帶一路」經濟規劃，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同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經貿合作。作者認為廣州政府對伊斯蘭教的相對寬鬆態度，是因為伊斯蘭教在中國有較悠長的歷史而被政府視作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沒有被傳教的擔憂（頁191）。但作者忽略了目前「一帶一路」經濟政策在其中的引導作用。事實上，多種因素共同導致大量穆斯林在廣州和義烏聚集。

（二）研究方法的反思

作者採用了團隊合作的研究方法，訪談亦通常是在「群聊」的情況下進行的。林丹和楊場常因為中國人的身份而難以獲取非洲人的信任，但一個由白人男性和中國女性組成的學者團隊，就會消滅一些負面的猜疑。此外，英文流利的中國女性往往對外國人有種「特別的吸引力」（頁25），林丹和楊場也因此能夠得到很多外國人的關注和積極回應。而麥高登順勢加入聊天，將他們發展成為研究對象。筆者認為，作者不僅應該寫明研究的方法，同時也應該探討此方法對研究產生的可能的影響。首先，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如果有一部分的男性訪談者是因為對女性採訪者感興趣，進而發展成為研究對象，這極大可能

會造成訪談對象群體的某些同質性，從而導致研究結果的偏向性。比如，本書鮮有非洲女性商人案例，雖然這符合大部分非洲女性商人在廣州停留短、基數小的實際狀況，但這是否與作者的抽樣方法有關？這也造成了作者在第二章討論歧視問題的時候，由於性別視角的缺失而不能夠深入探討性別這個因素。例如，之前談到的案例中那位來自美國的白人商人可以在廣州無證駕駛，作者的解釋是該男子的膚色決定了他受到的社會優待。但這一分析缺乏性別角度的考量——這樣的優待是否一樣適用於白人女性？同樣地，在來自肯尼亞的女接待員因為自己的膚色被拒絕進入高級會所的敘事中，除了膚色（以及其膚色暗示的經濟地位）因素以外，是否還有性別等其他因素呢？其次，研究團隊中的各個成員的身份、背景、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群聊的參與人員數量，都會對研究結果產生一定的影響^⑧。

同時，作者的身份角色的優勢和局限性對研究結果也會產生重要影響，而本書缺少對此的反思。筆者認為主要體現在三點：第一，麥高登因為自己的外國人身份，除了比中國研究者更容易取得非洲人和其他外國人的信任之外，他還可以進入一些中國籍的研究者很難或者不能參與的活動，如一些地下外國教會的活動。這些教會成員中有很多簽證逾期滯留者，他們對政府有更多的負面情緒，從而也可能會導致作者一些觀察的偏向性。第二，由於受限於語言，他對中國研究對象的訪談和觀察更多是依靠林丹和

楊場進行。第三，他探討了膚色和國籍對外國人在廣州的社會地位的重要影響，但是沒有反思自己作為白人研究者可能產生的一些特權 (white privilege) 問題^⑨。筆者此處並非批判作者身份的局限性，因為白人特權和語言障礙是很多外國研究者在中國做研究時都會遇到的問題，而是認為作者沒有反思這種身份局限性和因此可能導致的研究結論的偏向性。比如，他的電腦在小北被維吾爾人偷走，但很快就通過維吾爾人的內部網絡尋回 (頁 85-86)。他認為這是因為維吾爾人在維護自己的民族榮譽 (ethnic honor)，並將這種不借助於警察等正式法律途徑解決糾紛的方式視為「低端全球化」的一個特色。但在筆者看來，這個例子亦可以理解為白人特權。因為如果失主是中國人，或者是女性，結果可能會不一樣。同時，或許此事無關全球化的高端、低端，而是這些維吾爾人在按照伊斯蘭教教法處理事務。這種依照教法而不參照世俗法律處理紛爭的情況，在中國其他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中也有出現^⑩。2013至2014年間，筆者也在小北做非洲人群體的研究，但筆者的田野觀察和本書作者略有出入，甚至有相反的發現。比如，筆者發現有一些非洲女商人在廣州定居做生意；再如作者談到廣州沒有非洲伊瑪目 (頁 184)，但是筆者調查中發現非洲伊瑪目的存在。根據伊斯蘭教遜尼派 (為在廣州的絕大多數中國、阿拉伯、非洲穆斯林所信仰) 的教義，群體中一個知識豐富的成員可以成為領導大家禮拜的伊瑪目。這既有研究者身份

角色不同的原因，也有因此而產生的研究群體的特殊性和偏向性的原因。

(三)「低端全球化」的局限性

作者將全球化分為低端和高端的二元框架，使得以廣州非洲小商販為代表的「低端全球化」和以西方跨國商貿集團為代表的「高端全球化」割裂開來。筆者認為，這種二元劃分有待商榷，尤其不應忽略「低端全球化」和「高端全球化」之間的流動性和模糊的邊界。首先，「低端全球化」的某些特徵並不是其獨有的，也存在於一些高端企業團體的商業實踐中。比如作者強調「低端全球化」對聲譽的重視，認為是與「高端全球化」的一個區別 (頁 83)。但是「高端全球化」中的大公司同樣、甚至更注重自身形象^⑪。其次，「低端全球化」代表的非正式經濟和「高端全球化」代表的正式經濟有交叉重疊的地方，兩者之間的界限也愈來愈模糊，例如有學者認為非正式經濟和正式經濟之間是相互關聯的^⑫。非正式的商業形式並不是所謂的「低端全球化」的非洲商人商業實踐的唯一途徑。作者自己也承認，同一個個體可以同時參與低端和高端的商業活動 (頁 84)。如果「低端全球化」和「高端全球化」是相互交織重疊的，那麼作者將全球化劃分為高端與低端是否有必要呢？同時，作者將非洲商人在廣州的經濟活動視為低端的觀點，容易造成一個片面的概括，導致讀者加深對發展中國家民間經濟活動的刻板印象。

作者將全球化分為低端和高端的二元框架，使得以廣州非洲小商販為代表的「低端全球化」和以西方跨國商貿集團為代表的「高端全球化」割裂開來。這種二元劃分有待商榷，尤其不應忽略兩者之間的流動性和模糊的邊界。

五 小結

綜上所述，儘管有值得商榷及需要深入探究之處，但社會現象永遠是複雜多變的，非一本書能夠窮盡。作者一方面秉承了人類學深度細緻的田野調查傳統，另一方面通過將非洲商人納入到全球化經濟，在中外關係的視角中重新思考中國人和非洲人在經濟和文化上的交往互動，生動刻畫出非洲人和其他外國人群體在廣州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本書行文語言嚴謹的同時略帶談諧幽默，值得一讀。

註釋

① 此書由麥高登獨立執筆，但書中採用了林丹和楊瑒的田野材料。中譯本將於2018年12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② 雖然本書書名提到「外籍居民」，但主要討論的是非洲人群體。作者指出，「非洲」是一個廣義詞，來自不同國家地區、族群的非洲人之間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同時，北非國家雖然在地理上位於非洲大陸，但當地人更認同自己為阿拉伯人（也常因為膚色淺被中國人視為白種人）。作者強調書中所指代的非洲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為了行文方便，筆者也以「非洲人」或「非洲商人」來指代來自撒哈拉以南國家和地區的人。

③ 參見 Adams Bodomo, *Africans in China: A Socio-cultural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Africa-China Relations* (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2012); Lan Shanshan, *Mapping the New African Diaspora in China: Race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Belong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④ 參見 Gordon Mathews,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⑤ Jeremy MacClancy, "Popularizing Anthropology", in *Popularizing Anthropology*, ed. Jeremy MacClancy and Christian McDonough (London: Routledge, 1996), 13-69.

⑥ 蕭鳳霞：〈反思歷史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學刊》，2009年第2期，頁118。

⑦ 鄒磊：〈新絲綢之路上宗教與貿易的互動：以義烏、寧夏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頁37。

⑧ 參見 James H. Frey and Andrea Fontana, "The Group Interview in Social Research",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8, no. 2 (1991): 175-87。

⑨ 參見 Paul Lichterman, "Interpretive Reflexivity in Ethnography", *Ethnography* 18, no. 1 (2017): 35-45。

⑩ 參見 Matthew S. Erie, *China and Islam: The Prophet, the Party, and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3-4。

⑪ 如2018年5月星巴克公司 (Starbucks Corporation) 因為某員工言行不當而關閉美國所有門店，對員工進行反歧視培訓。參見 Adam Gabbatt, "Starbucks Closes More than 8,000 US Cafes for Racial Bias Training", *The Guardian*, 29 May 2018, 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8/may/29/starbucks-coffee-shops-racial-bias-training。

⑫ Martha A. Chen, "Rethinking the Informal Economy: Linkages with the Formal Economy and the Formal Regulatory Environment", DESA Working Paper, no. 46 (July 2007), www.un.org/esa/desa/papers/2007/wp46_2007.pdf.

江秋雨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人類學博士生